

老子的社会理想及其历史嬗变

杨选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以老子“复根”、“玄鉴”的思想方法,解读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及其嬗变的思想根源。老庄以至真、至纯的初民社会为镜鉴,批判和反思现实社会的战乱、压迫和文化异化、文化工具化倾向,其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老庄的社会理想,反对政治和文化专制,“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救世转向救心,由救人转向自救,由彼岸转向现实此岸,追求逍遥自在的人生,放情于山水之间,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隐道路,对中国古代隐者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以老庄至纯、至朴、至真的理想社会为镜鉴,反思社会文化,促成了魏晋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社会理想;文化异化;仕隐道路;老子;庄子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3-0110-06

从表面上看,老子“小国寡民”和庄子“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退步性、空想性显而易见,然而老庄以“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的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反观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社会分化、文化演变、政治斗争的对立、异化、压迫、战乱等社会现实,试图追寻一个没有对立、压迫、战乱,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虽然采取了激烈的反对舟楫、甲兵等社会进步的物质成果,抨击了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文化的复古立场,但其对文化的反思,对祥和、自适、自在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在后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儒家的“大同”思想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老子以后的道家 and 魏晋玄学家却对其称颂、继承、发展,并转向为对内在精神自由的追寻,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学者对这种社会理想发展、传承的历史文化原因

分析却大多语焉不详。本文尝试从老子社会理想及其历史嬗变的哲学基础和社会文化意义角度作初步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老子的社会理想

生活在春秋时代,作为周王室守藏室之史,老子亲眼目睹了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的过程,对当时诸侯杀伐混战、以大吞小、恃强凌弱,统治者阶级骄奢淫逸,平民百姓困顿、求生不易的社会现象十分不满,反复予以批判。

(一) 老子的社会批判思想

第一,老子反对诸侯战争,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他指出:“师之所处,荆棘生。”^[1]“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1]一是因为战争破坏农业生产,使田地荒芜,生产力破坏;二是因为战争杀人众多、血流

收稿日期:2014-01-07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112)

作者简介:杨选德(1965-),男,陕西韩城人,副教授。

成河,是屠毒天下生灵的不道德行为,是社会衰败的直接原因。

第二,老子抨击统治阶级贵族们的骄奢生活是建立在劫掠基础上的不道德行为。他说:“朝甚除,田甚芜;食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1]土地荒芜、仓库空虚,而贵族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劫掠百姓的强盗行为,是社会困顿的根源。

第三,老子指出统治阶级剥削造成了人民的困苦生活,揭露社会不平等的黑暗现实,强烈谴责“厩有肥马,野有饿殍”的社会现实是“率兽食人”。他尖锐地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愤慨地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心有余奉天下?其唯有道者。”^[1]

面对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老子的解决方案为:一是寄望于“有道者”;二是希望统治者“无为而治”;三是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说:“治人事天,莫若嗇……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1]他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巩固社会基础、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他反对奢华,崇尚纯朴,反对多欲,主张无为,希望通过无为、抑欲、崇道,建立一个返璞归真的社会。

(二) 老子心中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

老子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使有什佰之器而不同,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楫,无所用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

从老子的描绘中可以看出,理想社会一是否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意义:置什佰之器而不用,甲兵、舟楫皆是多余之物。二是使人安土重迁。社会交往是对其理想社会的破坏。交往就会有比较,就会使人竞争、比较而失去质朴纯真的心境。三是自得其乐、无欲无求。人们不用各种新奇的器物、工具、不与外部世界交往,在自己的天地里自甘其食、自美其服、自安其居、自乐其俗,从而达到人人自主、自由、自乐、自适。

以老子的智慧,难道看不到“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没有实现的现实基础么?我以为这只能从老子的哲学思想解释。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又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本源,要与道同化就要守住道的本原。而人类社会的本源就在结绳而用之的初始状态,“小国寡民”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反者道之动”,社会愈演化,离道愈远,不若守雌、归朴;守雌、归朴方能不失其真,才能最终回归到道的境界。老子没有看到每一次循环往复都是一次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回归。这也许就是老子历史观的局限所在。老子向往的是社会的本真,结果却表现为历史的倒退。

(三) 老子与孔子、墨子、孟子历史观的异同

面对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孔子推崇周公的礼制,墨子崇尚大禹,孟子则祖述尧舜。这些看起来和老子一样,都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但仔细考察,他们有着明显的不同:孔子希望用周公礼制来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墨子、孟子则是借古圣先贤的历史事迹论证自己的学说,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树立旗帜,指向性非常明确,这不是历史观而是论证方法。至于后代儒家言必称三代或者与孟子用意相同,或者是误读夫子所致,老子“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种复古主张才是其历史观导致的。但老子理想的重点是百姓的自化、自乐、自正、自朴,是道法自然。

在现实政治、经济领域,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难以接受老子的“小国寡民”,然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自得、自足、自乐、自由的精神诉求却具有深远的文化精神意义,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和精神家园。在社会现实下,人们在求得精神解脱、抗拒社会异化与灵魂扭曲的情境中,老子的社会理想具有精神家园意义,受到了后代知识分子的追崇与向往;老子所描述的理想国像一面镜子,对解决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演化中的内在矛盾、冲突,甚至文化的异化、工具化具有镜鉴作用,对以后文化的发展、思想的反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庄子和玄学家的继承过程中不断演化。

二、庄子对老子社会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老子的社会批判思想得到庄子的继承与发展。庄子把社会批判的重点从经济、军事领域转向文化

思想领域。

(一) 庄子对文化、道德沦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斗衡、绳墨、规矩、道德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尺度,然而大盗却“并斗衡而窃之”;一切文化、社会的规范、尺度、标准都被“大盗”窃取而据为己有,并用以压迫平民百姓。庄子直接指出了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局限性、工具性、政治性和阶级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权力面前的无奈和无力。而“大盗”就是诸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这种振聋发聩的批判直指当时社会的不公,透视社会伦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道德规范的社会本质。庄子对文化异化及其工具性的批判和抗拒,解释了一切阶级社会的文化共同属性,可谓一针见血。庄子使人们在肯定文化整合功能的同时,不得不对文化的异化保持深刻的反思。

(二) 庄子对道德目的论的否定

庄子直接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念,指出了道德价值与社会选择背离的现实悖论。人能弘道,道却不能弘人。庄子希望人们超越现实观念、价值,不要为某种社会利益、目的而追求道;而要无待、无己、无功,自觉追求道的生活,追求逍遥、自由,坚守自我、自在、自乐的精神境界,不逆道而行,不为流俗左右,不做他人的工具和牺牲品。

庄子看到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双重性,采取了取消主义的态度和选择来消解这种双重性产生的矛盾,就是抛弃一切政治和文化,返璞归真到自然原始状态。他说:“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大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2]这种比老子更激烈、更决绝的态度,是对战国时代政治斗争更为残酷的现实的激愤,是对统治者利用法律、文化道德等欺骗人民、压迫人民、愚弄人民、驱使人民为自己利益服务,为权力服务的强烈不满,是对仁义道德作用的根本怀疑和否定。他说:“闻在宥天下,而不闻治天下”^[3],他渴望一种自在、包容的文化。

(三) 庄子对老子社会理想的发展

庄子在继承老子社会理想的同时,提出一个“至德之世”的理想时代。他把历史分为4个阶段:“至德之世”,人们“莫之为而常自然”;三皇时代“顺而不一”;炎黄时代“安而不顺”;尧舜以来倡仁义、别善恶,用知识蛊惑人心,用教化扭曲人性,天下大乱。“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舍夫种

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2]他认为人们好知、对智慧的追求是天下纷乱的原因。

生产工具的进步不仅破坏了人与人的和谐,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夫弓、弩、毕、戈、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铍、罔罟、罾筍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颀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辨矣。”^[2]百家争鸣也是民惑、智诈的原因。

(四) 庄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为至德之世

在“至德之世”,人们“莫之为而常自然”,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以止矣”^[3]。“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2]与自然同化,与天地合一。

庄子继承了老子社会理想,主张把“小国寡民”的理想状态发展成为一个混沌初开的“至德之世”。老子和庄子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描绘了一个回复远古的社会蓝图,都有一个退化论的历史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1]而庄子描绘了一个由至德之世到神农之世,再到三代以至于今,由失德而渐失安顺以至于大乱的历史过程。庄子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描绘成自然法则堕落的历史过程。

但老庄的具体表述也呈现了各自主张的不同之处:老子针对以强凌弱、以大吞小的诸侯混战局面,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第一,庄子更多的是对文化的工具化及对人性扭曲的抗拒而向往“至德之世”。第二,庄子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认为社会技术的进步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乱象,而且造成鸟、兽、虫、鱼因人们的贪欲而不宁,他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乃至混一而化,人与自然同化的境界。第三,庄子强调人生的无目的性、道德的无目的性,用这种无目的性的人生观消解社会礼法、道德带来的压力和人性的扭曲,否定人们对欲望的追求,消解人们之间的竞争压力,以及竞争使人们失去本真、迷失天性的危险。总之,老子是从社会乱象中解脱而向往“小国寡民”的,而庄子则希望更多地从人性解放以达逍遥境界而向往“至德之世”。庄子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思想,对后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古代仕隐道路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也为那些在专制制度下的抗争者和逃避

者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精神归宿,为道家社会理想的嬗变和转型奠定了方向。

三、魏晋知识分子对老庄社会理想的继承与反思

魏晋玄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老庄哲学,在对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上却呈现出不同的路径选择。汉末以至魏晋,政治家和权贵们的所作所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践踏得体无完肤。冷酷的现实使许多知识分子从儒家之外寻求精神寄托,因而道家思想代替儒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魏晋思想家超越儒家的伦理观而继承道家思想,追求世界的本质、探索宇宙观的同时,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提倡崇本返璞、分劳任能的无为政治。然而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年代的魏晋时期,“树欲静而风不止”,无为亦不可为,没有实践的社会政治内外部条件。在无为政治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尊崇道家的思想家坚持认为社会发展、文明进化是一个道德退化的过程,是一个离真、朴、乐越来越远的不归之路,但是他们承认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他们崇尚自然,主张法自然,也看到欲不可去、争不可免的现实,这种矛盾的思想认识的内在张力,使玄学家产生了分化。

(一) 魏晋思想家和老庄一样批判社会现实,甚至提出否定封建君主制度的激进主张

庄子讲:“仁义之途,是非之端也”,韩非子也说:“儒以文乱法”。但魏晋学者进一步认为:“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趋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4]“上古至德之世,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4]无君无臣,无礼法,才是至德之世。

而鲍敬言认为君臣制度是巧取豪夺的结果,从而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他指出:“儒者曰:‘天生庶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

为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5]他认为君主制度是祸乱之源。他指斥君主“采难得之宝,聚奇怪之物,饰无益之用,厌无已之求”^[5],使民陷于极寒之境。“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5],“百姓养游手之人”^[5]。而百姓“人之生也,衣食已剧,况又加之收赋,重之力役。饥寒并至,民不堪命,冒法犯罪,于是乎生”^[5]。官逼民反,民之求生不得而走上反抗的道路。

而君主之道使人“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路开。……弩恐不劲,甲恐不坚,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无凌暴,此皆可弃也。……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为君,故得纵意也”^[5]。远古无君的历史成了否定君主制度的历史依据。在中国专制的时代,对君主制度的怀疑与批判凤毛麟角,鲍敬言的主张不是空谷绝响,而是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腐败的绝望与反思。葛洪批评鲍敬言“道家之言去妙好听,宜于议论难于实行”^[6]。这反映出当时议论的风潮,但鲍敬言等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思路,又回到了至德之世。鲍敬言以向往的心境描绘上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万物去同,相忘于道。”^[1]其对君主制的批判具有民主性倾向,是对君主制度的深刻反思。

(二) 魏晋名士由老庄的社会理想走向个性觉醒

既然社会不可为,社会理想不可实现,至德之世不可能到来,魏晋名士就地放下,怀抱逍遥自由的观念,转而追求个性解放;把老庄的逍遥自由与享乐结合起来,“越名教而任自然”,走向了人性觉醒的道路;抛弃纲常名教的束缚任性而为,追求自由、自然、自得其乐的个体解放与自由。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7]不能兼济天下,只有独善其身,阮籍日与竹林七贤饮酒论文,不与世事,但他们对人生的意义也发生疑问。他们以为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是立德、立功、立言,是反自然准则的,舍生取义是伤生损性的荒谬说教。他们认为人生在世,忽然而生,忽然而死,善恶贤惠,贵贱功过,死了同归腐朽。“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惠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

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模式——仕隐道路。

四、老庄社会理想演变的思想意义

第一,老庄社会理想的空想性质和循环的历史观无疑是错误的,但其社会批判思想对文化演化工具化倾向的批判和反思发人深省,面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人民困顿的社会现实具有明显的批判意义。儒家称尧舜、墨家称大禹皆是对现实政治的否定和批评,也是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不同的是儒家向往周公的礼制,墨家崇尚禅让式的尚贤和节用,道家更关注弱者的自由和快乐,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吞小的兼并战争,反对统治者暴敛无度、骄奢淫逸、敲剥小民的压迫,抗拒社会文化工具化、沦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的严酷现实。

第二,魏晋知识分子从老庄社会理想和社会批判出发转向对个体自由与逍遥的追求,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隐道路。秦汉统一中国,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制度化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思想,纲常制度法制化,在君为臣纲的逻辑下,作为臣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特别是经历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严酷政治斗争后,魏晋知识分子看透了在儒学外衣下政治斗争的本来面目,转而向道家思想寻求精神支撑。他们把道家思想作为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抗争现实政治的黑暗统治。老庄的社会理想也成为他们批判现实政治的理论依据。但他们显然明白“小国寡民”、“至德之世”不可回,因而只是以老庄社会理想为镜鉴,作为评判现实政治、文化的依据,从而转向追求个体自由与解放、追求逍遥与自乐,“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统治者保持距离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与尊严;一部分魏晋名士甚至由老庄的社会理想演化出君臣乃祸乱之源的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

第三,老庄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把社会理想置于历史的彼岸(未来是彼岸,但对于行进中的航船,出发地也是一种彼岸;与宗教把未来置于人生命的彼岸,寄予来世不同)。魏晋知识分子在彼岸不可达、现实不可为的困境中转而追寻心中的彼岸,并在山泉林壑为心灵的彼岸找到一个类似“至德之世”的空间情境,安放他们自由自适、逍遥

失,是所同也。”^[8]即使尧、舜、周、孔也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其死则“虽称之勿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也”^[8]。他们虽然否定了人生的意义,却厌世不厌生。“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故事;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谓遁人也,不杀可活,制命在外。”^[8]“不逆命,何羨寿?不矜贵,何羨名?不要势,何羨位?不贪富,何羨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8]抛却名利、富贵,就可制命在内,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一切由己不由人。

向秀、郭象以为鸱鹏与莺鸠各得逍遥。“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羨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9]而逍遥就不能制命于外,而要制命于内,要放弃纲常名教,放弃名利富贵,“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曰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外没有原因,道是“自然而然”的自主、自由运动;道就是制命在内,而无需外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舍弃纲常名教的种种规范约束,追求自然而然、自由自适的生活。嵇康的“七不堪”就是对各种社会习俗规范的否定。

这种逍遥的人生观,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繁闹的都市,隐逸于山泉林壑之中;有的隐逸于朝,却淡薄名利,与朝廷若即若离、用显弃藏、不悲不喜、与世推移;有的从心所欲,追求艺术、文学、养生,高谈阔论、品评人物,或医、或文、或酒、或药,快意人生。魏晋名士的隐有不得已的,也有自愿选择的。如陶渊明挂冠而去,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生活,就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东周时期,老子、庄子、鬼谷子等一批人作为隐者;据《论语》记载,孔子也遇到不少隐者。然魏晋隐者几成风气,从而形成了中国隐者文化。

魏晋思想家面对老庄社会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压力做出的这种路径选择,走出了远古的指向,转向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外在的山泉林壑,精神的自由、恬淡、逍遥和自然的辽阔、清静、博大融而为一,在学而优则仕之外开辟了一条隐逸自适的人生道路。崇尚儒家的知识分子,积极进取,学而优则仕,追求功名事业;崇尚道家的知识分子追求逍遥自适,在社会生活中游于艺、乐于心,或者在自然山水中感悟自然人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有的人甚至儒道兼于一身,或仕或隐、进退自如。仕隐结合构成了魏晋

自在的心灵,与自然同化、与日月同曦。他们在现实人生中,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找到了一条通往自由之路——隐者的道路,形成了一种隐者的人生观和隐逸文化。

第四,老庄社会理想及魏晋时期的转型,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在于他们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精神。老子用“婴儿”镜照人生的习染、用“小国寡民”来镜照诸侯混战,庄子用“至德之世”来镜照人类文化的工具化、政治化,魏晋知识分子用逍遥和“自然”来安放向往自在、自适的心灵,抗拒激烈的政治斗争及纲常制度的压力,无不具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反思和批判精神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条件,也是魏晋知识分子为后人称道和学习的主要原因。

五、结 语

在今天文化全球化、物质文化无孔不入、话语霸权无所不在的时代,在文化的反思能力越来越有限的背景下,现代人如何安置自己的心灵,如何避免变成单向度的人、变成他人和自己的工具;现代文化如何反思(不能反思的文化是可怕的)等等,都需要历

史的镜鉴和智慧的启发,或许我们可以从老庄和魏晋诸贤那里得到启迪。老庄社会理想正是反思和批判的依据,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乌托邦。这种崇尚自然法则的乌托邦是社会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的现实依据,却为无数在社会专制和纲常制度压抑下的心灵寄托了无穷的美好向往。

参考文献:

- [1]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 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庄子.二十二子: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 阮籍.阮籍集[M].李志钧,季昌华,柴玉英,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 葛洪.抱朴子外篇[M].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 [7] 房玄龄.晋书:卷49[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9] 庄子.庄子注疏[M].郭象,成玄英,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LAO Zi's social ideal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YANG Xuan-de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tiy, Xi'an 71007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LAO Zi's thought of Fu Gen root and Xuan Jia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ocial ideals of LAO Zi's small state with few people and ZHUANG Zi's world of supreme morality and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root for the evolution. Mirrored by the truly pure primitive society, LAO Zi and ZHUANG Zi criticized and reflected such problems in society as war, oppression, cultural dissimilation, and tool inclination of culture. Their re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Intellectuals in Wei-Jin period inherited LAO Zi's and ZHUANG Zi's social ideal and opposed autocra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y followed the theory of natural beauty beyond Confucianism. Their thoughts also changed, from world salvation into heart salvation, from saving people into self-saving, from the other shore into temporality. What's more, they pursued the freedom of life and reveled in the landscapes. What they had done opened a new recluse path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hermit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aking LAO Zi's pure, simple, and ture ideal society as a mirror, they re-thought social culture to promote the social trend of the awakening of human nature, which has a profou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culture.

Key words: social ideal; cultural dissimilation; recluse path; LAO Zi; ZHUANG Zi